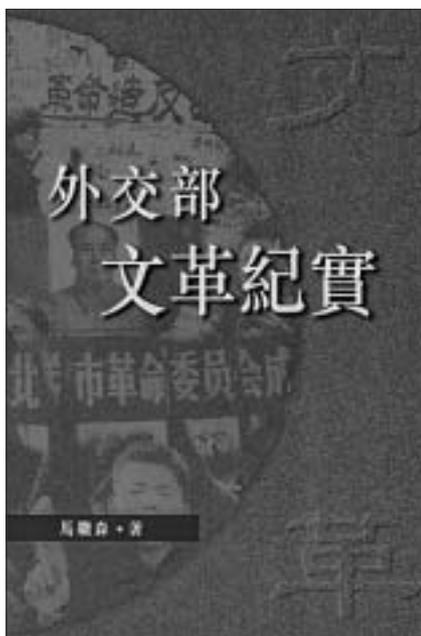


綜上所述，《權力的文化》一書以「林彪事件」為中心，但是其涵蓋內容遠遠超出具體事件本身。金秋寫作的重點與其說是為林彪鳴冤叫屈，不如說是探究「林彪事件」為甚麼會發生。該書對「林彪事件」具體

過程的細緻再現，客觀上有助於我們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政治的本質和肌理。儘管作者一再強調，該書着重探討的是一些「體制外因素」，但是在筆者看來，遭到扭曲的體制性因素的影響作用依然清晰可見。

「曲折」的文革故事

● 劉捷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以單位（如學校、部門等）為對象的研究，在學術界基本還處於起步階段。馬繼森女士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以下簡稱《紀實》，引用只註頁碼）一書就是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馬女士文革期間在外交

部工作，參與了文革，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成員，「在1967年犯了錯誤，對那以前和以後發生的錯誤也有深切的體會」（頁365）；除了《紀實》，她還曾經和冉隆勃合著《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窗出版社，2001）。

在撰寫《紀實》的過程中，作者搜集了大量文革時期外交部的檔案文獻材料，包括領導人的講話記錄、大字報、紅衛兵小報等，並採訪了許多歷史當事人。作者利用這些文獻和口述材料，為我們揭示了大量鮮為人知的事實。另外，因為作者的特殊身份，使得《紀實》一書還帶有半回憶錄性質。像郭贊之死、外交部內部對王海容與唐聞生二小姐的看法、喬冠華的性格等，在檔案文獻中都是很難找到的素材，但在作者筆下卻信手拈來。此外，此書文筆也相當生動流暢，頗有些行雲流水的感覺。

作者對以往有關文革時期外交部的研究是不滿意的。她認為：「三十多年來，外交部文革真相被演繹出的一幅幅漫畫遮蓋了。從這幅漫畫中看不出文革有甚麼不對，

「幾個反革命野心家要奪權」的所謂「故事」，是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文革敘事的範本，文革進程的複雜性因此被抹去，所以馬繼森說，外交部的文革是「曲折」的，而「外交部的曲折是全中國文革曲折的一個縮影」。

文革究竟是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在上層文革之外，是否存在一個群眾反官僚、反迫害的運動？儘管作者並不認為有「兩個文革」，但書中的若干史實可以為我們揭示毛澤東所謂「群眾有氣」的一面。

外交部只是1967年8月幾個反革命野心家要奪權。這種掐頭去尾又胡編亂造的故事講了30年，還在以訛傳訛。這樣能夠正確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嗎？」(頁364)其實，這種「幾個反革命野心家要奪權」的所謂「故事」，是現在中國大陸官方文革敘事的範本，文革進程的複雜性因此被抹去，所以作者說，外交部的文革是「曲折」的，而「外交部的曲折是全中國文革曲折的一個縮影。」(頁14)

全書的第一個亮點是對外交部黨委在文革初期「引蛇出洞」的描寫。《紀實》的第一章詳細敘述了在外交部造反派起來之前，外交部「當權派」對運動的掌控。陳毅、姬鵬飛等主要領導人一開始並不清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只是按照傳統的政治運動模式，試圖引導這場運動走上他們所能控制的軌道，「內外有別」的五條方針以及向北外派工作組由此而來。陳、姬等人甚至以為文革是一場「新引蛇出洞」的運動，他們表面上鼓勵人們貼大字報，大膽鳴放，但在內部卻磨刀霍霍，隨時準備再來一次反右，而且已經內定：貼陳毅的大字報就是反革命。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稱為「鎮壓群眾運動」的階段，在以往的文革主流敘事中基本被抹去，但其實這是文革進程中一個比較典型的階段，幾乎在所有單位(包括大學、中學)都存在類似的現象。

全書的第二個亮點是對外交部中群眾組織的細緻描寫。可以說，作者的個人經歷對這些描述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一般人在文獻中是看不到有關細節的，非親身參與很難了解其中的過程。從「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再

到「大聯籌」，外交部上演了一場場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活劇。這裏涉及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文革究竟是一個文革，還是兩個文革？也就是說，在上層文革之外，是否存在一個群眾反官僚、反迫害的運動？

儘管《紀實》的作者並不認為有「兩個文革」，但書中的若干史實可以為我們揭示毛澤東所謂「群眾有氣」的一面。比如，「在大專院校諸多的工作組中，外交部派往北外的工作組以鎮壓學生厲害聞名」(頁25)、「政治部成立一個龐大的運動辦公室，內設材料組，並派出聯絡員同各單位當權派聯繫，整了大批被認為有問題的人的黑材料」(頁15)。就連作者自己也說：「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挨整的人以百萬計，被整者受歧視，只能默默忍受。文革中挨整的人居然可以造反了，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奉命造反。」(頁37)《紀實》一書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馮耳元事件」，馮耳元當時是四川農業廳水產處的年輕技術員，他曾於1965年給陳毅寫信，批評陳毅在外交上的原則性錯誤，後遭到陳毅的打擊報復。但在文革期間，馮被請到批陳大會的會場，陳毅向馮鞠躬道歉(頁46)。

全書的第三個亮點是對人物的描寫，對周恩來、陳毅、喬冠華，甚至張殿清等小人物，作者都刻畫得非常生動豐滿，比起以往文革敘事中臉譜化、程式化的描寫是相當進步的。其中，給筆者留下比較深刻印象的還是周恩來。周對文革的態度長期都是一個諱莫如深的問題，幾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都認為周捲入文革是被迫的，通過現在披露出來的資料，可以認為這個觀點是成立的。周在毛發動文革之前並沒

有獲得毛的「路線交底」，但通過《紀實》一書可以看到，周在文革初期短暫的困惑後調整好了與毛的關係，此後周對文革積極參與，並一度蓋過了中央文革的風頭，比如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

清查「五一六」是文革期間一個重大事件，據王力說，這個事件整了一千萬人，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冤案（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194-95）；文革研究專家王年一則認為至少整了幾十萬人。這個事件至今仍撲朔迷離，但可以肯定的是，外交部抓「五一六」份子的是周恩來親自部署的，周在這裏陷入到了「極左」的泥潭當中。但關鍵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呢？他究竟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言，掌握了外交部「五一六」份子的名單？《紀實》對於這些問題，並沒有給予很明確的答案，但在1978年，周的衛士吳慶彤曾經發表過一個關於抓「五一六」問題的講話，吳認定當時存在「五一六」這樣一個反革命集團，並直指中央文革才是「五一六」的黑後台，中央文革抓「五一六」是賊喊捉賊（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1期，頁45）。

然而，通過現在披露出來的一些資料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時與周恩來在抓「五一六」這個問題上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陳伯達和江青都曾經親自做工作，平息外交部的反周聲浪（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頁45）。這個時候，恰恰是周與中央文革分歧最小的一段時間（至少表面如此），周也明確地說：「我和中央文革之間沒有空子可以鑽」（頁256）。但

《紀實》的作者通過姚登山對王力「八七講話」左右為難的困境，又看出了周與中央文革之間的重大分歧，「原來姚登山只聽命於周恩來，而這之後，他既聽周恩來的，也聽中央文革的。而中央文革同周恩來又微妙地不一致。在外交上，周已經陷在極左裏，勉為其難，而他們還批評右了，監督是花瓶；周反對打倒陳毅，他們支持；周要穩住外交部，他們鼓勵奪權。姚登山貫徹王力指示，就不可避免地站在了周的對立面，這是周對他失望而不能容忍的。儘管他仍然執行周的指示，也無濟於事。」（頁257）。王力的「八七講話」確實存在反周的調子，但這個調子是不是中央文革成員一致的意見還不得而知。通過1969年後周與中央文革發生了多次激烈衝突的後見之明來看，周與中央文革（甚至是毛澤東）當時很可能是在暗中角力。

除了周恩來，陳毅是《紀實》着力描寫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因為作者搜集到了很多關於陳毅的未披露的文獻，所以對他的描寫佔很大篇幅。其中給筆者印象比較深的有兩點，一是陳毅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乾綱獨斷」；二是陳毅對文革那種深深的困惑至死都未能擺脫。陳毅性情豪爽，沒有甚麼心計，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屬於「挨整」的幹部。他本身存在極左的一面，1958年毛要陳毅接替周恩來的外交部長職務就是要陳毅貫徹革命外交路線，他在1960年代主持外交工作，一直積極貫徹毛澤東的世界革命戰略。但他又存在冷靜務實的另一面，比如在文革初期那麼緊張的形勢下，還力主不要讓劉少奇去接受群眾批鬥，這在當時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通過《紀實》一書可以看到，周恩來在文革初期短暫的困惑後調整好了與毛澤東的關係，此後周對文革積極參與，並一度蓋過了中央文革的風頭，比如清查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

作者認為「91人大字報」事件是對文革的一次有影響的抵制，但後來周恩來在糾正極左外交路線、中國外交開始轉向的過程中，重用的正是那些「91人大字報」的簽名者。這種及時的批判，恰恰是周恩來對他們的一種特殊的保護。

總之，筆者認為，《紀實》對人物的描寫是相當成功的，它使我們了解到歷史是複雜的，作為歷史活動主體的個人也是複雜的。當然，《紀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首先，是對某些史實的把握不大準確。比如書中提到「王力講話中說過一句話：『攀登峰有人認為不錯。』這個人其實就是毛澤東」（頁196）；事實上，王力指的是周恩來，又如「大字報的作者們把這個口號（指打倒陳毅）看成是王力和造反派勾結的產物，不知道後面還有毛澤東要假手群眾教訓陳毅的意圖。」（頁205）其實，毛澤東對陳毅的態度是「一批二保」，毛當時沒有打倒陳毅的意圖。

另外，《紀實》對部分史事的解說亦有未能令人滿意的地方。比如關於「91人大字報」事件，作者認為：「周恩來指示批判91人大字報本身就是極左。91人大字報雖然有某些事實不確切，但總起來講，它是對文革的一次有影響的抵制」（頁211）；但事實上，後來周恩來在糾正極左外交路線、中國外交開始轉向的過程中，重用的正是那些「91人大字報」的簽名者，人們在事後才漸漸醒悟到：這種及時的批判，

恰恰是周恩來對他們的一種特殊的保護（參見阮虹：《一個外交家的經歷：韓敘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212）。這件事很能體現周恩來政治上高度圓熟的一面。

又如，毛澤東在處理王力問題時引用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來回答王海容，實際上流露了對拋出王力的複雜心情，也隱隱流露出毛為形勢所迫而不得已的心境——主宰王力命運的毛本人也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把他拋出來，是受制於時局的無奈之舉（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而不僅僅如作者所說，只是「示意這幾個人已經完了」（頁189）。

《紀實》一書確實為近年文革史研究的優秀著作之一。作者相當成功地還原了那一段歷史，書中很多地方的描寫使讀者很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這一點在當下歷史學著作當中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另外，《紀實》的成功也為以後的文革史研究指明了一條路，即重視個體與微觀的研究。盡量避開現在還無法把握的宏大敘事，在現有條件下也許是一條較有效的研究路徑。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8年4月號、5月號

第73期 2008.4.30

- 劉超、馬翠 民國知識界與上海的人文生態統
涂少彬 論憲政主義語境下的公民主體性
張華強 民企：如何擺脫「富不過三代」的陰霾？——
「布登布洛克式動力」的啟示
韓琛 啟蒙時代的電影神話——關於第五代電影
的文化反思
高頌 獨立學院，愛你乎？恨你乎？

第74期 2008.5.31

- 范曉春 也談「高饒事件」發生的某些因素
林震 駕馭「第三波」：台灣和韓國民主化比較研究
甘會斌 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
邱加輝 李安《色，戒》的隱蔽敘事：改編張愛玲
廖四平、孟婕 「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從張愛玲
的小說《色，戒》到李安的同名電影